

自我小传（杂记）

朋友，当您无聊的时候，泡上一杯茶，欣赏俺写的杂记吧





俺出身农家，小学之前是个光屁股的淘气小男孩（穿的裤子都是开裆裤）。因为我父亲被打成右派而由干部变成农民进而过早去世，我的童年是在贫苦中度过的。如果我老爸不被打成右派，我的家庭就是干部家庭，那我也就算是干部子弟。小时候每当填表格或学校要开家长会时我常感到尴尬，有时很羡慕别人有个父亲，虽然我认为母亲是必须有的而父亲是可有可无的。也许因为我是在母系社会长大，我从小就胆小、心慈手软。小时候看到别人掏小燕子的窝或抓青蛙（残忍的拧掉青蛙大腿回家烧着吃），我心里直发痛，曾偷偷地帮倒忙放走别人捉的青蛙和小燕子或在别人捉青蛙时故意捣乱吓走青蛙。那时候时不时能看到被五花大绑游斗的阶级敌人或‘罪犯’，亲眼看到有些小朋友用土块或红薯皮去砸那些被游斗的人，我同情被游斗的人，真想站出来保护他们。我非常恨那些趾高气扬欺负弱者的强人。长大之后对小孩子绝对宽容、绝不打骂。对待弱小的动物更是像对待兄弟一样，看不得别人打猫和狗。直到现在回老家跟家里人一起吃饭时，家里的猫和狗总是想凑热闹一起吃点什么，当有人对它们不客气打它们走时，我暗自心痛（有时我也挺身而出说不要打它们），其实可能是因为我是把盘子里的肉或鱼慷慨地给它们吃才使得它们误认为跟人是平等的。小时候我家的猫半夜从雪地里跑回屋钻进我那暖烘烘的被窝，我从来不拒绝，冰凉的（有时身上湿漉漉的）它经常打着呼噜睡在我的肚子或胸脯上（好暖和、好舒服啊）。



我小时候最痛恨的人是那些恃强凌弱的家伙。记得当时有些大队或生产队干部组成小分队（很象解放前的土匪），他们带着铁杈等武器在村边的庄稼地巡逻，发现地里有猪时就围追堵截，有时甚至用铁杈直刺过去，可怜的猪被刺得血粼粼的（我们家养的猪也有过这种遭遇），当猪跑回家时家里人面对凶残强势的干部打手们除了抹眼泪又能怎样呢？这些干部们为了保卫生产队的庄稼而泯灭了人性，太过分太残忍了。还记得高寨村的一个生产队在收麦子时，麦田周围有很多等待拾麦穗的外村人（一般是生产队收割完毕然后放行让这些人去拾麦穗拿回家），这时候有母女俩人可能未等放行就捡起了麦穗，凶神恶煞的一个村官（是不是村官也不敢肯定）拿着铁杈猛扑过来，饿虎扑羊似的捣毁了母女二人的篮子（我们那儿称这种篮子为‘笆斗’，可以用来装粮食和面粉），她们二人肯定恐惧极了。我们村没有很孬（我们那儿称恶为孬）的人，但我们邻村有著名的孬人，这些孬家伙爱欺负良善的弱者，据说改革开放后这些人恢复了人性而不再凶煞了。

小学和初中均在农村就读，高中进县城，之后由大学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一步步走向大城市并走出中国进军到美国和日本的腹地，土孩子终于吃到了美国的洋面包和日本的生鱼片（其实还是我妈做的热馒头最好吃）。在美国的富人居住区埃文斯顿（芝加哥北郊）和洛杉矶，我和北大的一位教授散步时，他问我是否想象过拥有这样的豪宅和居住环境，我诚实地回答说没有。其实小时候我最羡慕的是穿上一身绿军装和吃上白蒸馍。我最爱吃的是刚出锅的热馒头和刚炸出来的油条或油饼，梦中饥饿时从来没有梦吃过肉，总是在梦吃热馒头或热油条。可是家人说我小时候（肯定是3岁以前）守在春节煮肉的大锅旁边啃尚未煮熟而伸出锅沿的大白肉（我似乎还真有一点点这种记忆）。上小学和初中时主要食物是红薯，我村离学校有大约4里路，放学回家的路上（特别是中午）烧心嘴里流酸水而不得不无数次蹲下来。一年到头只能在春节期间吃上肉，那时的肉太香了，至今想起来嘴里还流口水。79年农村改革后粮食马上就够吃了，上高中的第一年（79-80年）还在吃硬得像铁砖头似的玉米面馍，第二年就基本上全吃白面馍了。看来人民的饥饿更多是因为人祸。我们那儿的农民对邓小平是发自内心的感谢！邓小平使数亿农民吃饱了饭，真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上四年级时毛主席去世，全校师生带黑纱排队去悼念。其实当时我也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但就是掉不出眼泪（我当时衣兜里带了一瓣大蒜，临上阵时我把大蒜抠开偷偷地在眼皮上搽了一下。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作假）。有位女老师哭得很悲痛，一把鼻涕一把泪。毛主席去世的那几天，我们那儿有个成份不好的农民傻乎乎给他死去的老爸添坟，结果被大队干部五花大绑差一点打死。还听说我们乡有个小孩（可能是初中学生）在毛主席去世后开玩笑说要给江青说媒，结果被抓了起来游斗，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样。那个年代连小孩子开玩笑都得小心翼翼的，孩子们也就失去了天真的本性。当时有句顺口溜：‘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有一次一个同学说得太快了，竟然说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结果立即有同学威胁说要告诉老师，吓得那个学生快尿了裤子。

小学五年级之前处于文革时期，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接受贫下中农的管理，我在的高集学校至少一半时间是劳动，我们班经常排着队唱着歌去给生产队摘棉花（高年级的学生打砖坯烧砖，我们教室的旁边就是学生造的一个砖窑）。棉花地离我们村很远，我们年级只有我一个人是老高集村的（老高集离高集有几里远），经常是摘完棉花已经夕阳西下，别人离家近而且有同村的同学为伴，我就惨了，一个人摸黑回家，漆黑的小路两边是暗藏着坟茔的庄稼地，我的头发和脊背都能感觉到恐惧，为了壮胆，我采用大声唱或嚎的方式，即使这样我还是不住地回头和向两边张望，其实路边脚下就有坟茔，而且我也知道坟下埋着的这些死人有的是非正常死亡的（上吊的、服毒的、跳井的）。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在梦到这种极其恐惧的黑暗小路（迷茫、恐惧）。有时好心的同学会向老师给我求情（说我离家远，让我早一点回家），甚至有时某个同学还会送我一段路程（特别感谢有个叫李锁的同学）。

那时的农村学校条件太差了。上初一时我们上晚自习还得用自带的煤油灯，摆弄煤油灯至少占去了一半的自习时间，身上经常弄得油迹斑斑，而且夏天用煤油灯上自习时惹来了各种飞虫，当时要是能仔细观察这些昆虫而写出一本昆虫记就好了。小学和初中根本没有课桌，小学时的‘课桌’是土坯垒起的土台子（学生的腿当然无法伸直），初中时的‘课桌’是两头搭在砖墩上的长木板，经常是正在上课或自习时木板轰然倒塌，摆弄这些木板要占去不少时间。教室里的凳子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的，好多凳子都是四条腿不一样长（而且经常折断），凳子的表面往往钉有铁钉来衔接四条腿，我的屁股至少无数次被夹住过。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每年冬天我（几乎所有学生）的手、耳朵、脚都会冻伤，特别是手的冻伤，裂痕很深。小学冬天跑早操时我和同学们总是用手抓住棉裤，因为那时的腰带就是一根布条子，往往很松，棉裤很容易在跑操时滑落（那时的男孩子们根本不穿衬裤和裤衩，一旦棉裤脱落就会走光），有时腰带系成了死结，该撒尿时急得要死就是打不开而导致尿裤子（我至少因为这个原因尿过一次裤子）。初中跑早操需要起床很早，那时候家里、学生和老师根本没有任何闹钟或手表（校长有手表，学校的办公室里可能有个钟表），全靠人的生物钟或公鸡打鸣来起床，有时候我起床时还满天星星（我妈说她已经听到鸡打鸣了），到了学校呆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天明；但有时起床时天已经大亮，我吓得惊慌失措同时埋怨我妈没有早叫我（有时公鸡打鸣的时间也不可靠，害煞人也）。后来我干脆不住家里而搬到离学校很近（能听到学校钟声）的同学家里住，这样就基本上不会迟到违反纪律受罚了。



小学五年级时四人帮被粉碎了，学习正规了，我的‘才华’也突然显露了，数学表现得特别突出，一学就会，当上了学习委员成了老师的眼珠子并且扮演助教的角色，收发作业、帮老师改作业，教数学的樊老师首先注意到了我的小聪明，第一次跟我提起了以后考大学的事。其实我的‘小才’早已经显露过一次，那是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在高集学校上学的同村的几个伙伴放学后饥肠辘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掐路边麦田里的麦穗（把麦子揉出来吃），突然被大队干部给逮住了，下午让我们在金岗小学全体师生大会上作检讨，我的检讨书写得洒脱飘逸一鸣惊人（文笔非凡起高风啊），其中用了潇洒的成语（比如防微杜渐），让学校的老师刮目相看。上初中我们金岗大队的学生从高集学校搬到了金岗学校，开始有物理和化学课了，从此我一直是数理化三门课的明星，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物理老师是我本家的侄子，有一次我把他给我的一道高考题给做出来了，让他惊诧不已。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整个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次考试，久经沙场所向披靡，吾乃是一个东方不败，好像从未体验过当第二名的滋味，牛比啊，嘿嘿。小时候我家的土墙上贴的全是我的三好学生奖状，三好学生总是由全班学生投票选出来的，而且当场统计选票，完全民主！自从上小学到现在，获得的奖励证书摞起来应有一人高了。晒晒其中的大奖：最幸福的是初中（可能是1978年）在人和乡获数理化竞赛奖（5元钱加奖状），最高奖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乒乓球亚军（登上奖台感觉就象刘国梁），奖金最多的是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和中科院的优秀导师奖，最刺激的是被中国人事部选入‘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因此到延安参加培训，亲眼看到了当年毛主席和江青女士的洞房，那是真正的窑洞作为新婚用房），最古朴严肃的证书是郑州大学发给我的兼职教授证书，最艳丽的证书是党支部书记培训证书（我当过支书，至今还有人这样称呼我）。

.....待 续 （目前太忙了，嘿嘿）